

那些在香港的日子……

□长江

走过SARS的“淘大花园”——

非典,港人叫SARS。
2003年3月-4月,一场后来被医学界称为“非典型性肺炎”的传染病在香港爆发,位于九龙观塘区的“淘大花园”成为重灾区,短短几十天,染病离世的居民人数不断上升,最后多达41位,当时的“淘大”等号后面就是“魔鬼城”、“死亡城”。如今,9年的时间过去了,“淘大花园”是否恢复了生机?经过非典,那里的人们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?

以上这段黑体文字是2012年香港回归15周年的时候,我在《再访“淘大”》的电视报道中开头的一段“新闻导语”。

2003年非典刚刚爆发,我正在香港采访,当时的“淘大花园”我一个人也不认识,就查电话、打电话到业主委员会,一位叫蔡碧洁的秘书接了电话,然后很热心地协助我。后来我得知这位好心的大姐,在“淘大”疫情最严重的时候,并没有躲避,更没有逃离,而是每天坚持给已经住进医院的病人送汤、送饭,最多时,她一天煲的汤,竟然装满了25个保温桶。

碧姐,后来我就这样称呼她,在我2003年所做《新闻调查——走进“淘大花园”》的时候曾经一边流泪一边低声地对我说:“当时的报纸、电视每天都在报,说‘淘大’今天死了几个、明天又死了几个……”

香港九龙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3月初收治了第一位“毒王”的病人,致使与8A病房接触过的20名医护人员以及住院病人全部感染了SARS,那以后病毒便很快地扩散到了院外。3月26日,香港卫生署证实:淘大花园E座已有5个家庭的7个人发病;28日,感染人数已增加到63人;30日,剧增至213人;而4月15日,“淘大”小区感染了SARS的病人数已经迅速飙升到321人。万分危急中,特区政府不得不在31日凌晨下达了对淘大花园E座的紧急封楼令,这种情况在香港历史上也实属罕见!

尽管,在SARS之后“恐怖”气氛依然笼罩了这个拥有19座楼盘的小区不短的一段时间,但经历了非典,“淘大人”更懂得了身处困境,大家要彼此团结、守望相助。如果没有非典,我没走进“淘大”,守望相助这个词我在香港就是听过100次,也没有那一次切肤,这种精神本来就是香港人的固身之本,无论何时,遇到了什么糟糕的事情,大家心底都有一根支柱。

2012年,我又找到了碧姐,这次,她脸上的阴霾明显地已经驱散,开始笑着跟我说话了。她说:“今天,‘淘大’和9年前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,当年感染了病毒的312位居民,不能说身体一点后遗症没有,但人们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,很多人每天游泳,或用其他的方式健身,房价也恢复了,人气也渐渐聚拢了,我当年给你介绍的葛先生你还记得吗?当时他的妻子遭到了不幸,去世前不是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儿吗?温家宝总理来我们‘淘大’看望居民时,也是走进了他的家。”

我说:“记得,记得。孩子早产,按妈妈的希望生了下来。葛先生后来给这个孩子取名叫‘航星’,就是为了纪念妻子,要让孩子像天上闪烁的星星。”

碧姐说:“对,小航星现在已经是香港三年级的学生了。面对不幸,爸爸经常告诉他:这件事对我们家是一场灾难,但未必不是人生的一种特别的‘财富’。SARS以后,香港人实际上都这样互相鼓励——我们‘淘大人’也咬牙走过了那一段日子,我觉得人都更坚强了、更无畏了……”

无所谓你是哪里的人!

驻外多年,媒体记者、外交官,甚至包括很多留学生,时间一长,大家或许就都会有一点“同感”:那就是不知始从何时,“自己突然就说不清楚自己是哪里人了”。

2010年12月9日,CCTV原有香港记者站升格为亚太中心总部,辖下20多个国家和地区,“中心”统一指挥,统一运作。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唐英年先生前来揭牌,仪式后还写了“立足香港、放眼世界”的题词。作为联系人,我也是当时“驻港最老的记者”了,就“腿儿”着去中环取原件,按台里的指示,原件取回要送到北京——永久珍存。

路上,我遇到两个内地的女人。她们向我问路,试着用粤语:“不好意思,请问,置地广场怎么行?”我也用粤语回她们:“哦,建议你们去坐坐前面的叮当车,向西,一路向西,其中就有一站是置地广场,这样你们就可以体验一下香港过百年的老式交通工具啦。”两个女人听懂了我的话,道了谢就走了,身后还用下一串普通话,余音似烟,飘

进了我的耳朵:“嘿,这个香港人,对咱还挺热情,还提建议呢。”我心里一咯噔:“哎呀妈,咱什么时候就成了香港人了?”

2004年我刚来香港的时候,很多内地人想学粤语,同时,很多香港人也想学普通话,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气氛是陌生人走在街上,很容易就自由地交谈起来,而且谁先开口,谁就可以当学生,比如香港人一上来就跟你讲普通话,内地人也就没机会跟香港人练粤语。这样内地人便成了免费的老师。反之当然也一样。

我是认真真地拿着砖头录音机自学了两个月,但粤语太难学了,开始几度都要放弃。只是因为工作,要采访,得和当地的老百姓面对面,所以只有磕磕绊绊地一路坚持下去。没想到转眼几年,街上已经有人把我误以为是当地的local(本地人),哈哈,迟来的鼓励,可以领受,也值得小小的欢欣。

后来还是碧姐很认真地问我:“你是不是香港人,很重要吗?香港就是一座移民的城市。大家都生活在这里,这里也就都是我们的家。”

我第一次听到“谁住在这里,这里就是他的家”。这说法很友善,也很让人舒服。

香港的包容本来就是这座城市的砖瓦,几百年来各地的“移民”就是这样靠“把这里当成家”来一块砖、一块瓦地建设它、爱护它。彼此之间的和平透透一种你不易,我不易,大家在一起都见不到——男人女人,学生幼童,穿西服的,穿T恤的,每个人都默默地小步往前挪,不会挤,这辆上不去就等下一辆。因为排队,我总可以掌握准时间,知道差不多。多少人,我总可以上得去,因此就心里踏实,有一种很好很好的感觉——安全感。

咸鱼“赶饭”?

上个世纪80年代,央视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的记者站,那时候记者少,住宿、工作便都在一栋楼里,后来兵强马壮了,我们便在铜锣湾新租了办公室,这位置离我们的住地大约只有三站,或坐车,或走路,时间也都差不多,我没急事,一般都会甩开了双腿,不图强身健体,只图能多少减点肚腩。

“早7:30”,这不是指时间,是香港的一份小报,我每天步行上班的路上都能看到,有阿伯、阿婆会守在车站、地铁站和路口随手向人派发(香港类似的免费小报还有好几种)。我手里拿着报,一般昨天发生的新闻,一看标题就能重温一遍,此外报上总有一些漫画、散文、随笔,都用粤语,我便可以轻松读来,让粤语每日精进。

有一天,我在《am730》上看到这样一则故事,是香港已经奋斗有成、有钱、有地位的一位“大佬”所写,题目叫《咸鱼“赶饭”》。咸鱼无人不晓,在香港,很多菜式都与它有关,什么“咸鱼肉饼”啊、“咸鱼茄子煲”啊,等等,但“赶饭”是什么意思呢?我真不明白。

看完了全文,哦,我领悟了——“赶饭”,是如同我们内地人所指的哪道菜特别能下饭,比如红烧肉、回锅肉等等,而作者的用意在于,眼下香港的日子好了,可人们千万不要忘了香港过去曾经是那样的“穷”!大部分如今已经成功的人,过去的生活都过得很苦、很艰难。因此“咸鱼”便成了那时家家户户“赶饭”的必备菜,被装进了一种有特别意味的记忆盒子里。

“赶饭”的日子,“下饭”的日子,这个提醒似乎久违了,不仅是香港人,还有内地人,全体中国人过上好日子的时间都不长。香港有“咸鱼”,内地有“雪里蕻”、“豆腐乳”……旧时的光阴里,香港是靠着很多不忘“咸鱼赶饭”的人建立起来的一片繁荣,后来这繁荣还带动了内地,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。可是繁荣在手,如果不珍惜,什么时候一下子没了,那就很令人痛心。所以香港人不可以忘本,中国人也都不可忘本。

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,那时候香港曾被有惊无险了一次,要不是中央政府积极支持、特区政府勇敢担当,加上全体香港人的团结一心、共赴时艰,香港的经济很可能就会被一波巨浪给

冲垮,至少会倒退十年、二十年。

因此《咸鱼“赶饭”》的作者最后说:“现在与旧友聚会,我们对其他的菜,都很随便,都可有可无,但‘煎咸鱼’却是不能没有的——几个(过来的)男人们,臭味相投,是彼此间的默契,也是对昔日贫穷出身的一种凭吊”……

在内地,年轻人奋斗有个梦想叫“五子登科”: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、妻子、儿子;在香港,年轻人的梦想也有“四仔主义”,这“四仔”就包括了老婆仔、屋仔、车仔、和仔仔。大家都向往好的生活,梦想有,总比没有强,但梦如何实现,路在何方?

我在香港10年,差不多每天都有机会接触社会各界,我体会香港人之所以有力量,第一是务实,第二是肯吃苦,再加上会寻找机会,有什么事能做,眼快、手快,不犹豫、不抱怨、不好高骛远,也不怕一次次失败。同时还有一条,那就是根本不信天上会有哪块云彩专门为你遮凉,更不指望有一天,天上会掉下来什么大馅饼——专门给你的大馅饼。

我怎么都不会骗你……

在香港,我最喜欢做的事,就是到了周末,如果不加班,我就换上最舒服的衣服,趿拉着拖鞋,到菜市场(香港叫“街市”)去买菜,然后回来自己做顿“好吃的”或招待朋友。

我先生早我到港工作了多年,十次里有一次可能会跟我一起去挑拣,并帮我拿拿东西,但每一次他都会在我身后嚷嚷:“嘿,嘿,得了,得了,别比了,咱就随便买一点什么就行了!”我不听,女人逛街就是要挑挑拣拣、货比三家,不然买回来一些快断气了的鱼虾、老芥蓝、陈豆腐,我这个“好厨娘”岂会觉得心里窝囊?

不过,2014年我离开香港调回北京总部,看到内地的菜价也跟我当年在香港的时候差不多了(那时猪肉一斤要三十几,内地才七八块),慢慢地竟想起了香港的种种好处。这“好处”大事不说,咱不做社会学的论文;就说小事,香港的很多小事,让人称赞,令人回味。

香港的写字楼,也就是办公室,职员上厕所都有个习惯,谁去,先从前台取钥匙,用完了再放回原处,一般商业大厦里的厕所都不对外。

内地人对这个开始不太适应,总是忘。我就经常熬到膀胱涨得不行了才肯抬起屁股往厕所里跑,跑到门前突然发现没带钥匙,又跑回来取;有时钥匙倒是没有忘,但方便完之后又总不记得把钥匙放回去,结果弄得别人想再去,又四下里乱找。

所以,为了避免这种尴尬,有一天我就打定了主意要自己配一把,然后把钥匙和门禁拴在一起,这样我内急的时候就可以“抬屁股就走”,万无一失。于是我就上街去配钥匙。开始在铜锣湾,离我的办公大厦很近。一问店老板,价钱要8汶(8块港币)。我说前不久我在家门口配一把才6汶啊,你怎么比跑马地还贵(跑马地是香港物价差不多最高的地方了)?店老板并不与我抬杠,倒是“哦”了一声:“哦,我搞错了,头先配一把是8汶,现在,现在已经是15汶了!”我说:“怎么,又涨到15汶了?太贵太贵了,我不配了!”我就执意回家,下班后要在我路过的原来跑马地的那家店再配。结果,晚上我倒真的是去了那家店,但价钱发现也已经不是6汶,随着一段时间物价的提升,这家店早已涨到25汶了。

嘿!我没配,又没配,心里较上了劲。决定明天再回铜锣湾。毕竟自己多麻烦一次,10块钱就能省出来。

这样,我第二天又回到了第一家配钥匙的店铺,店老板一抬头,笑了,一定认出了我。他的眼神我能懂:“怎么?又回来了?我们家的价格是不是还算便宜?”我没好意思多看他,这一回也没有再讨价还价,心里其实已经在骂自己:“真没劲,挺大的人了,为这10块钱,拿着钥匙已经跑了第三趟!”

故事说到这里已经够丢人的了吧,不想接下来更出人预料:

我不再争执,配钥匙的小老板也就多少有点心生歉意。本来嘛,配一把钥匙15块,他没降价,我又重新杀了回头。他迅速配完,看见我早就把钱(没有零钱啊,只有100汶)拍到了他的柜台上(恨不得早交钱早走人),他在收钱的时候就

提醒我:“你可看清楚了,这是人民币啊,不是港纸,都是红红的,样子差不多。当然了,你如果执意要给我人民币,我也没意见,不过这样我就会赚到你15个percent(15%),哈哈,你要自己先想好了……”

我就不计较,15汶就15汶、人民币就人民币吧。

只不过配完了钥匙,我回想想:如果当时,我真的把人民币换成了港纸,我可能会省下那15%的汇率,但商家要是不提醒我,我岂不是压根儿就没发现我掏出来的不是港币,而是人民币?

香港的物价世界最高(在当时),但商家不宰人,一般一件衣物打折的余地也没多少,商量来商量去,半天也就给你免去几块钱的小零头,可20块进价,标100,然后再同意你砍到50,这样的“习惯”,港人也不常用、不喜欢……

她家总有“饺子、炸酱面”!

生活在香港,你基本上总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最好的。

香港人的确有优越感。但优越是常年积累的,别的地方没有。比如:尽管这里地少人多,尽管地铁也挤,但里面总是干干净净,没有臭味;街道永远水淋淋地像是刚被洗过;垃圾桶个大、到处都是,而且经常被清理,同时,外面的天热,香港的姑娘和小伙子却没有几个会被太阳晒黑,为什么?香港的街面上商店连商店,商店里面可以买卖东西,也可以供行人在里面随便穿梭,所以不必晒,冷气又足。香港的本地人就是这样,总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方法,让自己不必被闷热的气候所累、所苦恼。

早些年间(比如1997年回归前),香港人和内地人的关系怎么样,我不大清楚。香港历史上有6次大移民,内地人赴港是主要的人口来源。但2004年到2014年这10年,我正好在香港,发现此时很多香港人其实很愿意和内地人交朋友,彼此的语言一旦没有了障碍,大家也就都能说到一起,乐到一处了。

比如“行山”(发二声)。我们都知道香港小,各家各户的住房也都很逼仄(一般50平方米的两居室住着老少三代也是常事),但香港紧贴着城市,都有很多很多的“行山径”,专供人们爬山徒步,这个资源香港开发得特别丰富,处处行山的地方也都有地标“指示牌”,意思是如果有人涉险,按地标打电话,直升机就很容易在最快的时间把你找到。

还有烧烤。香港的一些公园设有专门的烧烤场地,都想不到政府会为市民打造得有多么的方便,不仅一小块平地给你事先辟好,炉灶先砌好,木头桌、木头凳也都准备好了出来。这些设施不仅是公共的、免费的,而且时时会有人来维护与更新。因此周末香港人举家(或和朋友一起),除了在酒楼饮早茶,到九龙、新界的200多处“离岛”去坐游船,更多的就是相约到山里来烧烤。

我在香港的时候也经常效仿港人,特别是有内地的朋友来,往往不一定非要带他们去时代广场、湾仔、中环,更会安排他们去离岛或进山,让内地朋友也见识见识意想不到的香港——印象里的“弹丸之地”,却原来竟有如此浪漫的蓝色与辽阔!

交往得多了,香港本地朋友也都跟我客气,他们知道我爱做饭,就经常提出要来我家一饱口福——炸酱面,还有北方的饺子。我作为主人,当然很荣幸。但作为北京人,家有来客,只做做水饺、炸酱面,那便显得有点“小儿科”。

不过,在香港你说做顿简单的水饺、炸酱面,那容易吗?

还真不容易。主要是难在食材。香港没有黄酱,也没有北方的面。他们的面粉没有劲,经不住擀皮,原本主要是用来做面包、糕点的。因此在香港要做一次炸酱面和饺子,黄酱我得从北京带,面粉要从深圳进,我和先生、女儿就一趟趟地经过罗湖口岸往香港这边“背面”,一口袋十斤或十五斤,很重,但为了捍卫北京炸酱面和饺子的尊严,我们也就从不厌烦,回报全在于,当香港的朋友不住地吃、不住地真诚赞美的时候,那辛苦就都值了,都值了……

小谢,永远都不会走远……

2010年的圣诞节是西方人的节日,中西融合的香港本来也应该和往年一样,贺卡、圣诞树,火鸡、礼物、狂欢、平安夜,又热闹一次。但这一年的香港不同,数月前的菲律宾劫持香港人质事件,让很多人心中还有痛,他们受不了欢乐的气氛,我也就偏偏在这一天,白天被邀请上门去对事件受害者的家属做一场电视专访。

“小谢”谢廷骏是8月23日发生在马尼拉街头人质事件中香港旅游团的领队,这次的绑匪门多萨要求政府给他这个退役的警察复职,他劫持了香港旅游大巴,最后造成22名游客中8死6伤的惨剧。

在事发当日,由于小谢的机智和勇敢,他第一个把信息传回了香港,港人这才知道自己的同胞在菲律宾出事了。在与绑匪长达11个小时的周旋中,小谢恪尽职守,努力保护游客,最后竟被门多萨当作“人肉盾牌”,绑在了旅游大巴的车门上,第一个被劫匪残忍地杀害……

香港人的心都碎了。

上午10:30,我和摄像提前来到了谢家,谢妈妈开的门,没有哭,情绪还好。我松了一口气。家里备了茶和鲜果。谢爸爸和两个儿子、小儿媳也都在场。小谢出事,谢妈妈还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家电视媒体的访问,这次答应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,我们彼此都觉得双方心头有了一份特别的友好与信任。

接到通知的头一天晚上,我其实很揪心——眼前立刻回闪过事情发生后的8月底,香港接灵回来时的那个夜晚,谢妈妈在机场扶棺痛哭,那场面,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无法再忍住眼泪——

“谢妈妈,谢谢您同意接受我的采访。那么我想问:现在这件事已经过去4个月了,您心里是不是平静了一些?还想儿子吗?”见面后,我说出了第一个很艰难的问题——“还想儿子吗?”谢妈妈答了半句,说:“现在还好”,但紧跟着,又泪如雨下。

我说:“想儿子的时候会怎样,您能做什么事情转移自己的注意力?”这是我事先预备好的问题,目的是不想让谢妈妈过于悲伤。

谢妈妈说:“没办法,我就知道坐在这儿”,她指指屁股底下的沙发,“想儿子了就哭,就坐在这哭。哭了,心里就舒服一点……”

在谢家,因为小谢在生前是一直跟着父母一起生活的,窄小的政府公屋,房间里我能看到到处都有小谢留下来的痕迹,比如一个洗衣机,是他生前用过的,包了塑料布,机身上有8个数字,写在一张A4纸上,那是小谢生前使用过的香港手机的号码。这部手机,门多萨刚一发现,就一拳打了过去,然后抢走,至今在哪里?谢妈妈说,“应该还在菲律宾警方的手中。”

我又问:“谢妈妈,在香港人的眼里,小谢是一位英雄,人人都称道他;在您心里,他是怎样的一个儿子?他孝顺父母吗?平时最爱做什么?什么事让您最思念、最割舍不下?”

谢妈妈说:“马莎(小谢的英文名字)哪儿都好,对工作负责,对爸妈孝顺,又很爱说话,外面做了什么事都回家来跟我说,还爱做公益事业,总想帮到更多的人……”

9月5日,离出事才十几天,小谢出殡,“妈妈哭得最厉害,因为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”。谢兄(小谢的哥哥谢志坚)对我说,“那时候,我们全家人的心情都还没有平复。”

“现在呢?”我转向问谢兄,“现在你们一家人的状态都好一些了?”

谢兄说:“这件事,别说妈妈,就是我们大家,什么时候提起,大家都很难过。只不过弟弟活着的时候,一向乐观,那我们全家也就不能只是聚在一起哭,我们也要改变,要做事,做一些尽量让自己开心的事……”

《狮子山下》,如同香港的“城歌”,这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,因为剧情抒写了香港草根阶层的挣扎与苦斗,从1973年一直播到1994年,整整21年,早已为香港千家万户的老百姓所熟悉。

那天采访结束,不知为什么,一走出小谢的家,我满脑子就都是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:人生中有欢喜,难免亦常有泪,我哋大家,在狮子山下相遇上,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。人生不免崎岖,难以绝无挂虑,既是同舟,在狮子山下——且共济……

小谢的妈妈最后跟我说:“生活还要继续,我儿子是做了他应该做的,我们心里都为他骄傲。那我呢,也不要总被他挂着,总要让他放心,对吧?”

多好的香港妈妈啊,多好啊——小谢的母亲!